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

談“紅旗譜”的故事與人物

王知伊 著

新文艺出版社

讀書运动輔導叢書(1)

談“紅旗譜”的故事與人物

王 知 伊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讀書运动輔導叢書(1)
談“紅旗譜”的故事與人物

王 知 伊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 5 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 号 1747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1 1/2 字數 28,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00 定價 0.11 元

“讀書运动輔導叢書”編輯凡例

(一) 全國各地區都開展了“多讀好書、多讀反映現實的作品”的運動，這套輔導叢書，就是想為配合運動的開展盡一分力量。

(二) “輔導叢書”中所分析評介的作品，以各地讀書運動中所普遍推薦的書目為主。

(三) 輔導文章，要求深入淺出地從政治上和藝術上來幫助青年讀者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並從這些作品中汲取思想力量，學習書中英雄人物的高貴品質。

(四) “輔導叢書”一般是每本分析評介一部文學作品，但必要時，亦可綜合輔導幾部文學作品或包括幾篇輔導文章。

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一	是小說，也是历史	I
二	两段故事——两次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	7
三	丰满的人物形象	20
四	亲切朴素的民族风格	41
五	巨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47

— 是小說，也是歷史

優秀的長篇歷史小說“紅旗譜”(第一部)的出版，受到千萬讀者的歡迎。這是一部革命鬥爭的史詩，也是一幅燦爛的歷史圖畫。

“紅旗譜”有廣闊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思想內容，有民族的气派，有流暢、生動的語言。這裡，作者梁斌同志寫了大革命前後農村階級鬥爭的面貌、寫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冀中人民的反抗、轟轟烈烈的“反割頭稅運動”和震動人心的“二師學潮鬥爭”。作品中的人物面貌大多刻劃得清楚、細致，作者很有說服力的描寫了這些革命的英雄人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漸成長的過程。梁斌同志曾經把他的創作動機告訴我們：

有人問我，怎樣想起要寫“紅旗譜”這樣一部書。我說，我還在少年時代，曾經體驗了舊中國時代廣大人民所經歷的苦難：那種悲苦與辛酸，那種痛苦和折磨，在我少年的心靈上烙下深深的印痕。此外，我受了時代的感動，受了很多事件的感動。①

这就是說，作者是要写出旧中国的苦难，写出他所經歷的不平凡的事情，写出一个时代的面貌。因此，这本书，我們可以看作：

是小說，也是历史

“紅旗譜”描写了1927年大革命前到“九一八”事变后将近十年間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階級斗争，以及这一时期內的階級关系的变化。但是，書的开端，却自清朝末年写起，作者笔下的第一章可以看作一个序幕。序幕的时代是处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辛亥革命的前夜，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国际上，世界資本主义已經进入壟断資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旧中国由于中日战争和馬关条約的签订，蒙受了极为重大的损失，列强对中国展开了爭夺战。当时，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要求，已經逐漸形成反滿斗争；1905年的俄国革命，更是給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紅旗譜”的“序幕”正是描写了当时的我国农民“为爭取人底初步权利”而进行的反封建的斗争。在小說里作者通过朱老巩大鬧柳树林的故事，把历史舞台的帷幕拉开了。

① 1958年5月号“文艺月报”，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紅旗譜’”。

这正是到处充滿了痛苦与眼泪的年代，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善良、勤劳而又勇敢的农民为了生存，起来反抗地主和軍閥的压迫。在朱老巩大鬧柳树林之后，作者从侧面写述了“朱老明三告馮老兰”的故事，然后才鋪开了轟轟烈烈的反割头稅运动的描写。这里，我們可以看到：农民的反抗斗争是有发展的，作者以故事和人物来闡明了我国农民革命从自发的反抗到有組織的斗争这个过程。

作者描写了这些英勇斗争的农民英雄的豪迈、朴质的性格，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就是朱老忠，关于这个人物的分析，我們留在后面再談。作者写他們和敌人的斗争是异常尖銳的，朱老巩、严老祥沒有能够阻止古鐘的被砸，以朱老明为首和馮老兰打的那場官司也是輸到底了，只有在反割头稅运动中才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馮家地主。試問：为什么前两次是那样，而后一次却是这样呢？原来，从我們偉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历史已經开始轉入一个嶄新的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从1919年起已成为工人階級所领导的革命，并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自发的农民运动一旦轉为有組織、有领导的革命斗争后，封建地主遇到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工人階級，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它就只能撞得头破血流而失敗了。

在作者笔下，我們可以看到这样两点。首先是作者

写朱老巩、朱老明的失败，并没有把他们的希望推到无可挽救的深坑里去，尽管是他们家破人亡，但是他们的斗志没有失去，他们记住、永远记住仇恨，教育着后代，并且想尽办法要战胜馮家地主。朱老巩大鬧柳树林的故事所以能够傳得那么远，影响那么大，主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理上，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相反，他们是由于出了朱老巩那样的英雄而引以为荣的。他们不仅使讀者同情，而且使讀者相信：他们有一天得到胜利，成为生活的主人。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当党在农村进行活动、直接领导了农民斗争以后，形势就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党领导了反割头税运动。严江濤是这个运动的組織者和鼓动者，他虽然年輕，但是指揮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而且終于取得胜利。党的胜利，这是人民的幸福。作者写出了党怎样在群众中生根，組織群众展开斗争；也写出了苦难的农民怎样在失败后取得沉痛的教訓，因而自然而然地紧跟着党走的心理状态。这和上面所說的一点是有联系的，因为这正是农民的复仇的火种的大爆发，他们除了“向着紅旗，跟着紅旗”走之外，再沒有旁的道路可走。

这一段时期，大約是在1927年大革命前几年。故事发展下去，作者用憤激的笔調写述着蔣介石反动派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它給予人民带来的深沉苦难。

1926年下半年，革命战争进行得极为順利，这对于

帝国主义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事。帝国主义为了破坏这个革命运动，帮助反动军阀抵抗革命力量的进攻，还勾引混在革命阵营里的反动分子从内部来破坏革命运动，必要时，还采取直接出兵干涉的手段。这时候，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找到了它们的新的代理人，那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

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蒋介石卖国集团投靠美、英帝国主义以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个事变的直接后果是：千百万人头落地，革命暂时遭到了挫折。在“红旗谱”第一部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些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起初，党领导了农民运动，造成了蓬蓬勃勃的、声势雄偉的革命斗争形势，对封建地主、军阀进行了打击，撼动了他们的统治。江涛领导的反割头税运动的胜利，正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中写述江涛的哥哥运涛接受党的派遣，参加了南方的革命武装队伍，这正是北伐运动的前奏。运涛在北伐军中当上了代理连长的消息，曾经带给他的故乡的农民以莫大的鼓舞和希望，这是当时人民对于革命胜利的天真、乐观的想法。后来，“四一二”政变后，运涛被反动派关进了监牢，北方的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与南方的官僚资产阶级，重重大山压在人民的头上，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小说虽然只是写了冀中一带人民的生活实况，但这却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面貌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助长了并更加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于旧中国的宰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已是十分深沉，反动派統治集团却在先“安内”、后“攘外”的掩飾下仍然进行他們的卖国阴谋。党及时英明地领导了抗日运动，要求抗日的呼声响遍了全中国。当时，毛主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紅軍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資产阶级、民族資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統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党的这一英明的政策，迅速地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实现。这就是“紅旗譜”的下半部所写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潮斗争的时代背景。

作者通过保定二师学潮斗争的写述，表现了当时民族危机的深沉、民族矛盾的突出，中間阶层向左转变的事实，并且描写了党在城市中工作的面貌輪廓。小說中所刻划的知識分子严知孝父女，主要是严知孝这个人物的出現，是有其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在那个时代，中間阶层向左的路子，也原是为客观的情势所要求、所决定了的。

历史的道路是綿长的，小說暗示給讀者，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保定二师的学潮斗争的发展，那就是作者预备在第二部里写述的农民游击战争的风暴——高蠡暴动。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和“紅旗譜”第一部中所表现的必然有区别、有进展。这里，就不多談了。

^① 轉引自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紅旗譜”第一部所描写的广闊的时代背景，简单說来，就是这样。現在我們再回过头来，看看作者是怎样以艺术的彩笔来生动地描繪历史的。

二 两段故事——两次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

上面說到，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大鬧柳树林是作为这部小說的序幕的，那么，小說的主要場景是哪些呢？

“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的学潮斗争”无疑的是小說中的两座“主峰”。另外，有一个插曲是“秋收运动”，作者写这个插曲虽然篇幅不多，但同样是写得有声有色的。

小說开端，作者是这样落笔的：“平地一声雷，震动鎮井鎮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馮兰池，他要砸掉古鐘了！”这是开門見山的写法，直接暗示給讀者鎮井鎮一带的农民与恶霸地主之間，将要展开一場不可調和的恶斗了。接着就直写小說的主人公朱老忠（小虎子）怎样亲眼看到这场斗争的展开，这里有声势汹涌的农民的憤激，地主的毒辣阴谋，以朱老巩和严老祥两人为首的斗争以及无可奈何的失敗。朱老巩是一个农民英雄，他在失敗后气愤得吐血而死了，这已經足以引起讀者的同情和憤慨。但是作者接着写述了朱老巩死后的悲惨場面：恶霸地主看到仇人倒下去后，也沒有放松一步，馮老兰派人半夜污

辱了朱老巩的女儿，逼得她跳河自尽，他的儿子朱老忠連夜逃亡，下了关东。这些情节的描写，作者是以极端悲愤的心情来傾吐的。有些讀者反映：当他們讀到朱老巩家破人亡的时候，就不自禁的掉下了眼泪。这說明了小說的艺术感染力打动了讀者，作者在刻划地主与农民——压迫者与被压迫、被剝削者之間的血海深仇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朱老忠下了关东，在二十五年之后携着妻儿又回到故乡来了，这是新的起端，讀者可以想象得到，朱老忠和地主馮老兰家必然会展开另一場尖銳的斗争。但是，在朱老忠离家二十五年这一段时间里，是否沒有斗争了呢，那也是不可能的。作者用側笔叙述了朱老明和严志和联合了二十八戶穷人跟馮老兰打官司的故事。这场官司，告到县，在县里輸了，告到省，在省里輸了，告到大理院，最后还是輸定了。作者插叙了这段故事，使我們可以看到农民是忘不了“祖輩几代的新仇旧恨的”。同时，告訴了我們讀者，在旧中国封建統治的年代里，农民是沒有可能在敌人的政权下面得到絲毫便宜的。

朱老忠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回到他的故乡的：“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銅劍鏢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分血仇！”他一回来，就和战斗的兄弟严志和、朱老明、任老拔等聚在一起了。他們有共同的愿望：去掉压在头上的大山——地主，幸福地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这个愿望虽然

很简单，却是几千年来未曾实现的。所以，朱老忠只好怀着满腔的悲愤，熬受着苦痛和暂时的忍让，这种心理状态在作者笔下刻划得十分感人。当他的儿子大贵被抓去当兵的时候，他痛苦地在敌人面前作了“让步”：“还是从长里想的好！”朱老忠为什么要“让步”呢？我们可以理解：他父亲的失败，朱老明、严志和的失败使他懂得对付这样凶狠的敌人不能凭感情用事，而是一定要从长里去想。

但是，朱老忠尽管英雄，他的伙伴们尽管斗志坚强，他们的斗争能够胜利吗？他们的命运难道会超越历史上千万次农民起义、千万次失败的规律吗？朱老忠“忍让”以后又将如何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是需要得到解答的。作者趁读者在为朱老忠他们着急的时候，不慌不忙的把中国共产党在当地领导革命的县委书记贾湘农介绍给了读者。这个人物在书里一出现，上边提出的问题就不难想象可以得到合理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来到了农村，地主和农民、敌我之间的斗争就改变了形势。馮老兰那伙地主们遇到了新的对手。在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他们的威风难保了。小说写到严运涛和贾湘农会面之后，运涛把情况告诉给朱老忠。朱老忠立刻感到了兴趣，“两只眼睛放出明亮的光芒”，当运涛说出这人（贾湘农）一定是共产党后：“朱老忠畅亮的笑着说：‘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人讲道过，苏联无产阶级掌政，打倒资本家。

和地主，穷苦人翻起身来……你要是扑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朱老忠的儿子大贵刚被抓走，痛苦和新的仇恨缠着这个英雄，现在听运涛说遇到了共产党，就使他从痛苦的深渊中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英明的党领导了英雄的人民，我们可以预期得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会有新的开展，农民将不再处于屡战屡败的局面了。

当时党的主张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要除三害：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小说通过贾湘农和严运涛、春兰等农村青年相往来的描写，让读者看到党的政策怎样受到农民的欢迎，党怎样在农村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革命的风暴就要起来了，到来了。

作者在写述了严运涛南下参加北伐革命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加深了人民生活中的苦难等情节后，主题就牵引到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运动上来。作为高潮的一个插曲，还写了党的“保属特委要在滹沱河与滹龙河两岸开展秋收运动”。

插曲所占的篇幅极少，主要写的是共产党员张嘉庆在河南里张岗一带的活动。这个运动比反割头税运动早一年多，它的成功是党在农村中展开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实例。小说的作者写张嘉庆动员农民进行斗争，抢棉花落笔不多，却是有声有色。这个“插曲”，可以看作是跟着而来的反割头税运动的前奏曲，写了它，让读者看到党在锁井镇一带地方已经扎下了根，农民已经扑向党的胸

怀，党和农民的关系是那样深厚，这样，规模更大的反割头税的斗争，以至这个斗争的取得巨大胜利，写来就更充分合理了。严志和和动员他进行反割头税斗争的小儿子江涛之间，曾有这样几句对话：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什么就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儿就上来，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收’，‘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父子间的这段对话，正好说明秋收运动在农民群众间的影响和反割头税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通过秋收运动的描写，开始塑造了形象鲜明的“张飞”型性格的张嘉庆这个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秋收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反割头税运动的浩大声势就象疾风暴雨那样冲击着读者的心。

无论“秋收运动”或“反割头税运动”都反映了农民反对国民党和土豪劣绅斗争的史实。根据文艺报1958年第五期“老战士话当年”这篇关于“红旗谱”的座谈会记录，

我們知道作者寫述這些故事時是以當時的生動鬥爭和活生生的參與鬥爭、領導鬥爭的英雄戰士為模特兒的。例如：書里反割頭稅運動群眾大會上講話的江濤，梁斌同志自己說是以現在在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工作的張金錫同志為模特兒的；而這個運動也就是在當時博野、蠡縣農民暴動以後搞起來的蠡縣反割頭稅運動。小說中的真人真事的成分很大，但是卻不是枯燥的歷史的記載。

作者是怎样來描繪這個廣泛和深刻的農民運動的呢？

首先是作者從黨的領導這一個方面寫。在這方面，作者不僅通過賈湘農、嚴江濤等共產黨員的參與和領導這個鬥爭來加以闡明，而是進一步的在黨與農民的血肉關係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來加以描繪的。書里一再明確提出：搞秋收運動和反割頭稅運動是黨的工作任務。黨走的是貧農路線，辦的是窮人的事。黨怎樣在農民中間樹立了很高的威信，寫得是比較清楚的。

其次是作者賦予了這個運動的鮮明的政治性。農民在年集上舉行了反割頭稅的大示威，他們的遊行隊伍砸了稅局子，搶了鹽店，沖垮了保安隊的鎮壓，逼着縣長答應“暫時不交割頭稅”，這就不同於朱老班的“赤膊上陣”和朱老明的“聯合控告”了。當嚴江濤去動員朱老明參加鬥爭的時候，作者描寫朱老明的心理狀態道：